

百年沧桑
鉴往知来

朱梅光
著

JIN DAI ZHONGGUO
WAIJIAOSHIXUE YANJIU

近代中国外交史学 研究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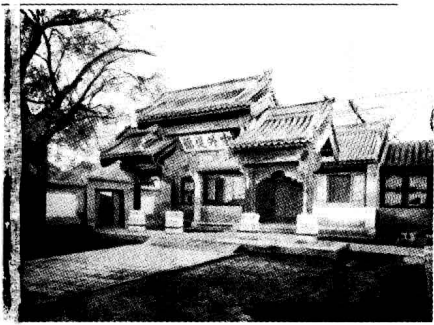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

朱梅光 著

JIN DAI ZHONGGUO WAIJIAOSHIXUE YANJI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朱梅光著.—合肥:黄山书社,2012.1

ISBN 978-7-5461-2640-1

I.①近… II.①朱… III.①外交史—研究—中国—近代 IV.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755 号

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

朱梅光 著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王海宏 刘 羊

责任印制:李 磊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585959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2640-1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001
一、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	001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006
三、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	008
四、概念界定与撰述旨趣	016
 第一章 官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	022
一、修纂经过与原因考察	022
二、编纂机构及其体例特点	030
三、保密及其史学价值	044
 第二章 王氏父子与《清季外交史料》	054
一、王彦威的生平、治学与思想	054
二、编纂刊印三部曲	063

三、继承创新的编纂体例及影响	076
第三章 蒋廷黻: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	090
一、学术渊源及其研究	090
二、史料评论和编撰贡献	097
三、“学术化、历史化中国外交史”	106
四、构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体系	119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外交史料出版的新局面	131
一、故宫博物院的外交档案编纂	132
二、民国当代外交资料的出版	146
第五章 起步阶段的断代民国外交史研究	159
一、两者生平与研著情况	159
二、风格迥异的两部史著的对比考察	166
三、史学价值与意义	186
第六章 中国外交通史的研究和编著	191
一、刘彦与外交通史的开拓	192
二、深入发展期的研究概况	205
三、从实践到理论层面的可贵探索	216
第七章 王芸生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234
一、史料编年的“大手笔”	235
二、中日外交史之研究	249

三、探讨中日相处共存之道	260
结 语	270
一、近代外交史学的主要特点	270
二、不足与反思	284
参考文献	288

绪 论

一、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涉外事务的扩大,产生了探讨“夷务”问题的外交史著。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近代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该书记载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史;继之有王韬的《华英通商事略》,系根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口译而著录,主要记述自明崇祯至清道光二百年间中英通商的历史。

与此同时,晚清官方外交史料的辑录活动也在悄然启动。主要分两途进行:首先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的中外交涉史料,与三朝实录同步修纂,总冠名《筹办夷务始末》,这部大型史料汇编,编例精详,价值极高。后王彦威、王亮父子又以私人之力,抄辑军机处光绪、宣统两朝的外交档案,编为《清季外交史料》一书,是为三朝《始末》的续作,从而较完备地保存了鸦片战争至清末近七十年的外交档案。第二条途径为咸丰末年总理衙门成立之后着手分类保存的“清档”。它是

在洋务派重要首领文祥指示专人编纂《洋务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兴起而完备的,与《始末》的“实录体”有别,该档强调“分门别类”,分专题汇编,从而检阅更为方便。

总理衙门的成立之于外交史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清档”的编辑,还在于直接催生了一批日记体外交史著的出现。随着洋务派官员频繁的遣使出洋办理外交,总理衙门规定出国使臣须写日记定期寄回,这样就产生了一大批洋务派外交大臣的出使日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陈兰彬的《使美述略》、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等。这些日记不仅反映了清朝外交官们对世界各国的认识,而且如实记载了各自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是一种日记体的近代外交史著。

在以上官纂史著之外,私家修史也时有出现,如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唐才常的《各国交涉源流考》、屯庐主人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倚剑生的《中外大事记》、庄病骸的《外交思痛录》、钱恂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和《光绪通商综核表》、罗惇齋的《中英滇案交涉始末》和《中俄伊犁交涉始末》、陆元鼎的《各国立约始末记》等。上述史著因其是在洋务派“对外羁縻”外交路线指导下写出的,因此多反映了洋务派以“柔远抚夷”论和“春秋盟会”论为代表的特有的外交思想,以及“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因识力所限,这一类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上多为传统史论式或掌故式著作,与近代学术多不符合,但其救亡图存的思想具有时代意义。

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后共80年的外交史学已如前述,可以“传统外交史学”名之,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传统外交史学”发生质变,以科学化与近代化为归宿的发展取向,则将此后的

外交史学带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若泛泛而言,1902年创刊的《外交报》在“文明排外”的主旨下,系统进行外交“学”“术”之辨的阐述,就已经具备近代学术研究的新思维。但严格来看,明确提出“历史化、科学化中国外交史”,鲜明承认外交史乃“科学”观念的蒋廷黻,才是开启这一风气的首要人物。在推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走向科学化上居功至伟,他构建的理念体系和话语系统,对当时学风的变革、体系的建立以及学科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其带动之下,外交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初步发展,重要表现即在于科学编辑史料高潮的出现。总体观察,20世纪30、40年代,外交史料的出版呈现两个方向:其一,延续三朝《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的出版传统,继续大量编纂出版有清一朝官方外交史料,以故宫博物馆1932、1933年出版的《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中日交涉史料》、《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和宣统朝为代表。其二,开始出版当代外交史料,以《外交部公报》为代表。两方面互相结合,带来了史料编辑科学化的革命,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新”“信”“要”“通”等史料编辑原则的发掘和达成共识。

此一时期,“学术化”外交史的设想也在逐步实施,外交研究机构、报纸杂志和教育课程纷纷设立,以助推外交史研究飞速发展。其一,外患日深,民间及官方纷纷成立外交研究会、后援会、评论社之类的组织,其代表性的机构,主要有东北问题研究会、南京外交评论社和重庆外交问题研究会等。这些组织立足现实、探寻历史,无论各自的立场、观点如何,在繁荣外交史学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其二,与研究会相伴随,外交报纸杂志也纷纷出现,现在能统计的就不下几十种,如《国民外交杂志》、《外交季刊》、《外交月报》、《外交评论》、《外交周报》、《外交研究》等,是其中较有影响者。它们是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其风格和主张又引领该

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三,学校中相关外交史专业及课程的设立,不仅大学开设有外交史的相关课程,就是中学也出现了为普及外交知识而开设的课程,这对于专门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

由于科学化的理论和史料编辑,加上新型学术平台的展开,至30、40年代,外交史学进入一个相对繁荣发展的时期。外交史书大量出版,各种不同体裁的论著纷纷涌现。这种史书编纂越来越精细化的分类,为近代中国外交史学走向科学化提供了难得的史学实践。

在各种体裁的论著中,通史性质的外交史著最为丰富。此类著作可以回溯到刘彦,其代表作《中国近时外交史》、《中国近三十年外交史》前后相继,开启了通史体外交史著编纂的序幕。刘彦之后,曾友豪、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先后问世,较有影响。而王正廷的《中国近代外交概要》、徐国祯的《近百年外交失败史》、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夏天的《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苏乾英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吴君如的《近世中国外交史》等等史书蔚为风气,共同推动了通史体外交史书的编纂。

其次,断代外交史的研究和撰著也开始起步,这类著作涉及国内与国外,国内主要是对晚清及民国外交史的编纂,国外则集中在关于当时结束不久的欧战外交史的编纂上,如刘熊祥的《清季四十年外交与海防》、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洪钧培的《国民政府外交史》、包华国的《战后欧洲政治外交史》、王绳祖的《近代欧战外交史》等,是其中研究较深、编纂精细之作。

第三,中外双边外交史的研究,也成为当时研究的主要课题。此类史书主要集中在中国与日、俄、英、法、美、葡、德等国的双边关系上,在每一小类著作中,又各有代表作。如王芸生的《六十年

来中国与日本》、陈博文的《中俄外交史》及《中日外交史》，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中法外交史》、蒋成晟的《中德外交史》、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等，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双边外交史研究的风貌。而其中最有影响者当推王芸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他以亲访搜集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

第四，边疆交涉史的研究和撰著也在兴起。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藩属、边疆逐渐深入内地，在近代中国边疆地区，若以受难深重、交涉频繁为标准，其热点地区则有东北三省、云南和西藏等地，因而近代外交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就集中在此，如谢彬的《西藏交涉略史》、蒋廷黻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张凤歧的《云南外交问题》等，就是其中代表之作。

最后，海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中国外交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海外因素的推动。可以这么说，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国内学者都有自觉翻译和吸收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史著和理论。综观这些译著，在先后上各有特点，前期主要集中在日本学者的著作翻译上，后期则转向欧美，这也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一致。如日本学者平田久的《十九世纪外交史》、有贺长雄的《欧美十九世纪外交史》、陆奥宗光的《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神藤才一的《欧洲近世外交秘史》、英人怀德的《中国外交关系略史》、白兰德的《东三省外交史略》、美国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尼尔林的关于美国外交史著作等，先后被翻译引进，其研究方法与编述范式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面对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①，本书力图在这一全貌之中，选取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和重要史籍，以史料和史学相互依存与促进的辩证关系为线索，来做纵向的深度考察；同时又以专题分类的形式，来做横向上的广度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上述进程的考察，为我们勾勒了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系谱。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日益增多，围绕通商、传教、驻使、领土、藩属等问题，中国与世界列强时起摩擦和矛盾，最后都以清政府的被动受约、屈辱失败而告终。正是在此背景下，过去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传统外交理念和藩属进贡的外交体系渐渐走向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新的不平等的外交理念和体系。晚清此段“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史学上自然会成为当时官私史学编纂者为剖解困局、借鉴历史经验以资图变的诉求对象，至此中国近代外交史学正式发轫。晚清外交史就其质和量来看，虽然尚显稚嫩，但这些诉求对象因其内容全新，而成为晚清史学突破传统史学的创新因子之一，在中国史学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形势，险恶依旧。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更加多样，各自扶植势力相互构衅，国际上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危如累卵，民族存亡也命悬一线，

^① 本节关于晚清外交史学的叙述部分，主要参考了三部著作的相关章节：胡逢祥、张文建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章第2节，马金科、洪京陵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章第3节，以及李恩涵的论文《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该文收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0年12月出版的《六十年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中。

内外交困的时局形势更加深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忧患有识之士,将这种困境的受孕之母回溯到晚清屈辱的失败外交,遂有各种体裁外交史著的不断问世。同时,受西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一批留学海外人士的回归,在外交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外交史的热潮。如此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近代外交史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逐步走向近代化与科学化之路,在史料的阐发、史观的革新和方法的运用上,与晚清外交史学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术群体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开始建立具有自我特色的新的学术范式。如此,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从此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与脉络。

与传统中国相比,外交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已成为治史者的共识,它所能施之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博弈作用,已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乃至每一步发展,都已与内政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因之承担了更多维系民族危亡的职责。研究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对外交史的研究,自从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在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学起步发展阶段,不少专家学者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论著,渗透着他们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也积淀着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因此,系统地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探索其学术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研究这个专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可以开拓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经过百年的发展,在一代代学人以科学化为趋向的外交史研究和专注下,外交史学科在近代中国也由创立而不断走向完善。从史学史的角度来总结和评价其成就与得失,无疑可以大大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

的研究内涵。

其次,为外交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学术支撑。在其创立初期,外交史与相关学科如国际公法史、国际关系史,乃至纯学理探讨的一些学科如外交学、国际学等学科,处于相互纠合的状态。后来随着该学科的不断发展完善,始与相关学科离析分野。而外交史学集中于史实层面的学术史探讨,它可以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事实根据和经验判断,并进而为其学术研究的展开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

最后,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更加深入全面的回顾和学习。“读史使人明智”,中华民族是个重视史学的民族,历史留下的经验是一个民族发展长河中的文明精粹,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这段中国近代史,更是中华民族一段灾难深重的血泪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的一部分,更应成为我们回顾温习这段历史的重要阅读对象。同时还可以古为今用,鉴往而知来,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为当今在国家利益博弈的国际舞台上,以全新的国家形象和地位出现,以实力为后盾的中国外交活动提供有益而丰富的历史资鉴。

三、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

学术界将中国近代外交史学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但微观、具体的个案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下面就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回顾。

晚清外交发展史可以细化为官纂外交史料和私人撰述两种途径,长期以来,学界在关注前者以外,对以三朝《始末》为代表的晚清官方外交档案史料的研究,也有所涉猎。就国内来说,最早发掘《始末》史料价值者为蒋廷黻。20世纪20、30年代,故宫博物

院文献馆陆续影印出版了清代官方外交史料,随着这批史料的问世,他及时发表评论文章,予以阐发其价值,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第37卷9、10合刊,1932年5月7日)就是其代表,而发表于1932年10月1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的论文《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又从另一个角度——《始末》的出版在推动中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上的作用——论证了它的问世对于处于材料短缺困境中的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巨大价值。在次年10月写成的《清季外交史料序》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

在蒋氏之后,有关三朝《始末》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以故宫影印本和上世纪60、70年代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为标志。前一阶段,除蒋廷黻外,还有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与上述蒋氏观点相呼应的有萧一山的《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国立东北大学《志林》第3期,1942年1月)一文,但其中的观点比蒋氏晚了十年。张德泽在《故宫文献馆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辅仁学志》8卷2期,1939年12月)一文第四节《宫中各处之外交史料》中,对故宫文献馆发现三朝《始末》的经过进行了阐述。齐思和先生在《晚清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学报》第2卷,1949年10月)一文中,将《始末》安排在第四节《晚清时期关于当代史的纂修》中来论述,则有其深意。他认为三朝《始末》的出现,一方面是当时兴起的本朝史编纂的延续,同时就其关于外交内容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将《始末》放在晚清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这样就突出了此书的编纂在两个方面对传统史学的突破意义。以上是此一阶段主要成果。

中华书局点校本是后一阶段开始的标志,首先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张守常的《〈筹办夷务始末〉·〈洋务纪事本末〉·

〈总理衙门清档〉》〔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与何双生、刘德麟的《清代官修的外交档案资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学林漫录（五）》，中华书局，1982年〕。张文将三朝《始末》与《洋务纪事本末》、《总理衙门清档》比较论述，得出《始末》一书编纂体例上的优缺点。后者对前人没有道及的编纂人员、原因及三朝《始末》的各自特点进行了专论，将《始末》的研究推向深入。另外一些专论史料、文献的论著以及史学史书籍及辞典类的书籍，则对《始末》进行了著录，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曹喜琛、韩宝华的《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略》、柴德赓的《史籍举要》、马金科、洪金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档案文献辞典》等为代表。而海外学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摘录史料和编制索引上，如台湾学术界对三朝《始末》一书中有关台湾史料进行摘录登载，美国学者饶大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制《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索引》（1960年2月由美国亚洲基金会印行），即为其例。另外，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为了重新检讨对近代中国的认识，遂于1948年由日本文部省特拨款给予学人从事中国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1954年春以《筹办夷务始末》为主要凭借的《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篇）正式印行，即是其主要成果。

以上是学术界对三朝《始末》的研究概况，比较而言，学界对王彦威、王亮父子及其《清季外交史料》的研究成果，就不如前者丰富了。在上世纪20、30年代《清季外交史料》出版面世之际，当时一些专家学者如蒋廷黻、胡适、蔡元培、顾维钧、袁同礼等人都为之作序，大力推介这部清末外交史料汇编，在他们的序言中，对此书的编纂经过、特点及其价值等等，与三朝《始末》都做了初步

的探讨,但之后学术界对此书一直未再做进一步的探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就海外学界来说,对此书的研究也非常匮乏,主要是台湾将此书中的一些有关台湾外交史料单独摘出,编入近代史料丛刊。

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作开创性研究者,当属蒋廷黻,因此学界对其研究也就颇多。首先,台港及海外学界对蒋氏的研究,虽然多着墨于其中国近代史上的方面,但也附带而及其外交史领域的论述。上世纪60年代初,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作品为:李敖的《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及《蒋廷黻选集》初版(序)、吴相湘的《蒋廷黻的志业》和陈之迈的《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70年代后,张慧中的《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及其贡献》、王聿均的《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和美国学者查尔斯·里莱的《蒋廷黻:介于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等,其中查尔斯的论文为我们提供了影响蒋氏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西方的思潮和流派。进入90年代后,相关研究逐渐深入,主要有黄德宗的《蒋廷黻及其政治思想的演变(1895—1935)》、林文仁的《介于两个世界之间——蒋廷黻和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陈永红的《蒋廷黻的现代化思想》、林子侯的《蒋廷黻传》,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汤本国穗的论文。其中,林文通过分析蒋廷黻学术思想渊源中的实用理性主义脉络,重点探讨了他与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一体性”,展示了他在中国外交史研究中所呈现的思想特性:“介于两个世界之间”,认为蒋氏思想上存在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对历史研究的学术等三方面相互交错,并试图以此说明其思想特性与外交史研究间的互动。

相对而言,内地学界对蒋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主要是因为蒋特殊的背景造成的,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其研究开始兴